史前经济基础考古视野里的最初中国形成

何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一、已有考古观察早期中国形成观点的简述

近年来，关于早期中国的话题十分火热，正如曹兵武先生所言，“历史学、文化学尤其是快速发展的考古学等，已经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关于早期中国的关键性的新认识。[①]”在关于早期中国的考古学讨论中，学者们纷纷从自己的视角，提出对早期中国的考古认识。

2009 年，许宏先生出版了《最早的中国》，立足于二里头遗址考古研究，从都城考古的角度，向公众解读他对早期中国的认识[②]。2014 年，许宏出版了《何以中国》先生继续秉承都城考古的视角，以中原地区史前和原史时期考古资料为基础，解读二里头“中国”是如何形成的[③]。我称之为“都城考古视角下的中国”观点。

2011 年 8 月 19~21 日，韩建业先生主持召开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学术讨论会”，并以《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为题[④]，正式提出“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这一观点。2015 年，他出版了《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⑤]，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文化中国的观点。段宏振先生秉持类似的观点，认为中原核心文化区的形成，同时也是早期中国的雏形的形成[⑥]。新近，李新伟先生从考古学文化共同体视角的“最初的中国”[⑦]。我称这类观点为“考古学文化视野下的中国”观点。

我曾经从陶寺遗址聚落形态考古与“地中”意识形态的角度，提出陶寺是“最初的中国”，朦胧地感觉到“中国”最初的诞生就不是一个文化概念，而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⑧]。2015 年，我发表了《从精神文化考古的维度看中原观念的出现与形成》[⑨]，虽主要谈的是中原观念的产生，但实际上也涉及到“中国”最初的概念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国”，最初奠定于陶寺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到二里头文化，中国的概念很可能转变为“中原之国”的概念；秦汉帝国时期，中国的概念可能就不再局限于中原了。我将自己的观点称之为“精神文化考古视野下的中国”。

曹兵武先生提出了若干早期中国表现方面，他认为农业村落与中原地理优势造就了中国底色，这是早期中国的经济与环境的物质基础面；庙底沟文化彩陶的扩散表明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情感、心理与文化认知的“理念中国”出现，明显带有精神文化视角倾向；二里头文化的文化整合形成“共识中国”，显然是“文化中国”倾向；西周时期，随着洛阳地区地中观念的得到公认与“中国”名称正式出现，标志着“理想中国”诞生[⑩]，还是带有精神文化视角。

上述学界关于早期中国考古探索的理论视角虽各有不同，但各有千秋，也有各自的合理性。不过，已有的关于早期中国考古探索理论与实践的目光基本都局限在中原地区。由于已知的中国主体确实形成与中原地区，因此前期学者们的研究聚焦在中原当然是合理的。然而，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中国的诞生有着血肉联系，那么既然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走的多元一体化道路，中华文明形成的模式被严文明先生形象地比喻为“重瓣花朵”，早期中国的形成从理论上说也不会仅仅依赖中原地区社会的自发的自我进化便可以“修成正果”。除了中原地区海纳百川式的文化融合与技术吸收之外，来自长江流域和北方地区先进的文明因素、文化因素、政治成就、经济发达乃至意识形态对中原地区的刺激、碰撞、挤压，都会促进中原地区应激、对抗、自强机制的空前高涨，早期中国的形成便不可避免。因为中原地区的地理环境优势与农业经济基础，仅是国家产生的充分条件，但不能直接成为“中国”形成的必然条件。只有从经济基础到政治意识形态的视角，总览长江流域与北方地区对中原地区的碰撞以及中原地区的反应，才能全面理解早期中国为何在中原地区形成。我称这一观点为“政

治经济视野下的中国”。下面我将就“政治经济视野下中国”的形成，提出自己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求教于方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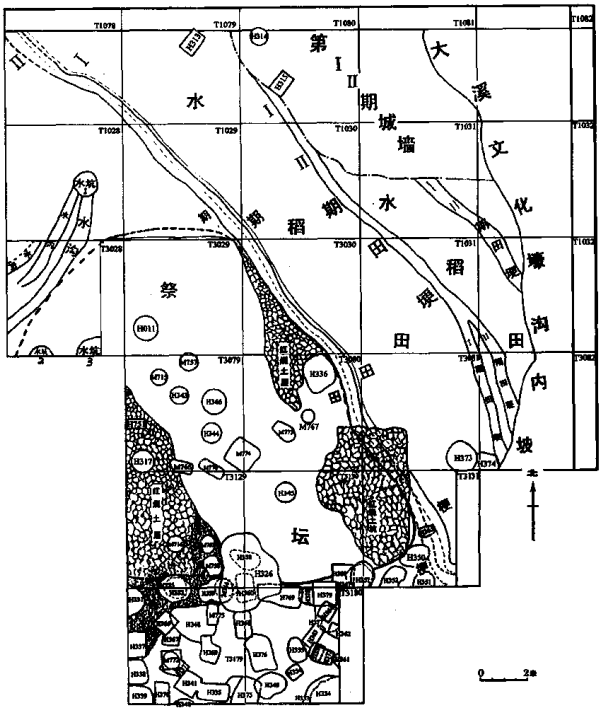
二、政治经济视野下的最初中国形成

曹兵武先生认为农业经济是早期中国的底色，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我认为有必要从理论上进一步辨析。农业经济可再细分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以生产商品粮为主要目的的农业商品经济。中国历史时期确实以小农经济为主，美国现代化农业则是典型的农业商品经济。前者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规模小，相对粗放，产能较低，需求是自给自足；后者生产单位很可能超越家庭，形成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甚至社会化，产能较高，需求是满足粮食市场。

在中国史前时期，不同地区实际存在着不同农业经济。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农业经济属于哪一类，目前的情况不甚明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小农经济为主，这是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史前农业，被学界理所当然地视为小农经济。但是，我根据长江流域文明的商品经济模式[11]以及崧泽文化的商品经济特征[12]，认为长江中下地区史前商品经济，除了石器、玉器、陶器、漆器、纺织品的商品生产之外，稻谷的商品粮生产，也是支柱产业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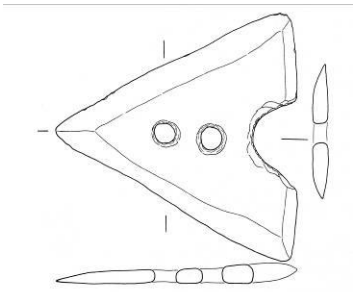
如果从考古遗存上来证明农业商品生产，就必须抓住农业商品经济的规模化、集约化、社会化、市场化的特征，寻找相应的考古资料来分析印证。从理论上讲，农业的规模化可从农田考古揭露得到的规模及结构入手考察，集约化可根据其深耕犁翻的特征从犁耕农具的角度着眼，专业化或社会化可以从专业化农业生产聚落来剖析，市场化可以从大规模粮食窖藏甚至粮食交易市场行为遗存来探索。

长江流域稻田的发现，最早例证应是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东门址下叠压的汤家岗文化时期的稻田[13]。虽然揭露的面积不大，却可以看到是一片比较完整的稻田，有比较简单的灌溉系统（图一），但是尚难以判断是家庭生产单位，还是集团化生产单位的稻田。



图一 城头山城址东门祭坛下叠压的汤家岗文化稻田平面图

但是长江下游崧泽文化时期，已出现数量较多是单体石犁头，多为等腰三角形，器身有穿，估计是固定在木质底座上使用[14]。昆山遗址和墓葬中出土大量的石犁头（图二）、燕翼形石刀（耘田器）成品，比如 M13、M10、M11、M25 随葬崧泽文化石犁头[15]，表明昆山遗址很有可能不是石犁和燕翼形石刀的生产者，而是消费者。长兴江家山遗址出土崧泽文化石犁组[16]（图三），不仅表明石犁早在长江流域崧泽文化时期便已成熟，而且说明有可能是集体劳作集中使用。更有趣的是，日本学者小柳美树分析昆山遗址是以集约化农业生产为主业的聚落，因为男女都参加农业生产[17]。



图二 昆山墓地随葬的石犁

图三 江家山遗址出入崧泽文化石犁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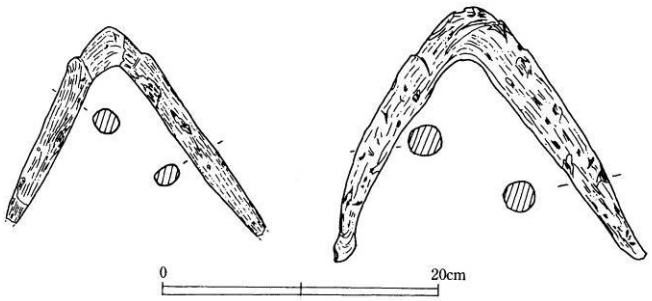
我认为，史前时期农业耕作模式有两种，一种是粗放式的包括刀耕火种耕作方式，生产效率比较低下，因此主要针对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另一种是集约化农业模式，以犁耕对土地精耕细作，通过深翻土地，提高单位农田的生产效力，从而增加单产。除了深翻土地之外，还要在单位面积的农田有组织地投入密集的劳力。基于此，我认为昆山遗址的农业劳力不分男女，集中全社区的所有劳力而为之，其目的显然是生产大量多余的粮食产品，以作为商品粮出售[18]。也就是说，史前集约化农业耕作模式主要应用于农业商品生产，因而成为农业商品经济的突出表现。

图四 庄桥坟遗址 H70 出土良渚文化组合石犁

朔知先生曾指出，作为“崧泽文化圈”的西部边地的皖江两岸农业经济欠发达，更可能依赖低端的石质木作工具商品生产与贸易，换取粮食以维持生存[19]。这意味着崧泽文化时期，皖江两岸很可能是崧泽文化中心区粮食贸易的重要对象之一。

良渚文化时期，集约化农业进一步发展。一方面，良渚文化将崧泽文化的石犁进行改良，将崧泽的单犁头与两件斜刃到组合成为复合犁，或称“分体石犁”[20]。其中保存最完整者系浙江平湖市庄桥坟遗址 H70 出土一套带木座的组合石犁（图四），证明良渚文化的复合石犁确实是固定在木质底座上的[21]。庄桥坟遗址良渚文化灰坑 H70 出的复合犁连带木座通长 106 厘米。其中石犁头部分总长 51、通宽 44 厘米。犁头部单件等腰三角形石犁头自身宽 24 厘

米，有三穿固定；犁头部分两翼分别由斜刃梯形石刀组成，石刀均长 26 厘米，前端宽 8.5、12 厘米，后端宽 16.5、19 厘米，且各有两穿固定。木质犁底座总长 84 厘米，石犁头部分嵌入底座部分长 29 厘米，石犁头部分之后的木质底座残长 55、最宽 21 厘米。木质底座尾端残存插入犁辕的榫口，残长 15.6、宽 8、深 0.8 厘米。发掘者认为庄桥坟良渚复合犁总长 1 米以上，只能用牛等畜力才能牵引。但是俞为洁认为良渚文化缺乏牛牵引犁耕的证据，很可能仍以人力牵引[22]。但是，宁波慈溪慈湖遗址上层（与良渚文化同时）出土木轭具（图五），呈∧形[23]，从形态上看似乎更适于牛牵引而不是人肩牵引。良渚文化水牛遗存虽然不多，但也可见水牛遗骨与石犁共存的考古存在背景关系，如江苏吴江龙南遗址 88M1 外侧的墓祭坑 88H1 内埋葬大量的水牛骨包括胫骨、股骨、肋骨，发掘者认为很可能是一头牛，共出有石犁、石刀、石斧[24]。尽管 88H1 显然是 88M1 墓祭坑，但是也不排除石犁与水牛配套最为祭品的可能性。所以我倾向于认同良渚文化的复合大犁很可能是牛牵引。当然，最终的定论需要基于将来以牛肩胛骨的拉犁骨骼变异形态研究分析结果[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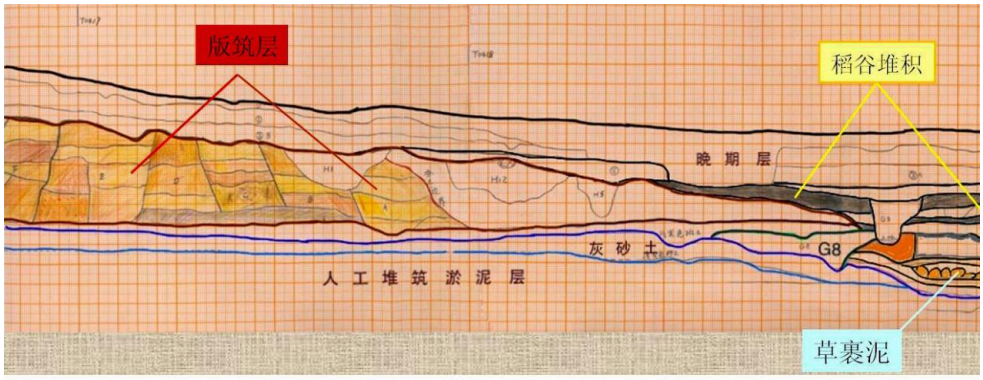
图五 慈湖遗址上层出土木质轭具

良渚文化牛力牵引犁耕的效率势必比崧泽文化时期人力牵引的单犁头石犁功效更高，因而庄桥坟遗址农产品足以保障本聚落的生存需求，或许还为更高一级聚落提供相应的物资。遗址地层和遗迹单位中出土大量陶片和炭化稻米以及其他植物动物遗存，似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这一点。而我则认为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庄桥坟遗址的集约化农业的大量稻谷产出，用于商品交换，更加符合集约化农业适用于农业商品生产模式的特征。

另一方面，良渚文化的农田也呈现出大规模社会化管理的迹象。如临平茅山遗址良渚文化中晚期稻田面积大，约 5.8 万平方米，约合 85 亩，晚期长方形地块通常 1000 平方米左右，更适于庄桥坟墓地出土的那种长 1 米以上复合犁的施展空间，同马家浜文化 1~16 平方米的稻田面积形成鲜明的对比[26]。茅山稻田有井和沟渠作为灌溉系统配套，田间阡陌规整，人工烧土铺垫田间道路，宽 0.6~1.2 米[27]，便于社会化集体耕作者的交通往来[28]。茅山遗址农田表明，良渚文化时期农业生产不仅规模巨大，而且茅山遗址很可能就是良渚文化稻作农业专业聚居，农田和人力投入上，规模都很大。如此社会化、集约化、专业化的稻作农业生产，必然的结果就是出产大量的稻谷产品。除了向上级聚落贡赋稻谷的可能之外，还存在着粮食商品交易的可能。诸如茅山这类专业稻作聚落生产出来的多余的商品粮，很可能输送到良渚都城市场进行销售。

良渚城址虽然迄今并未考古确定市场所在，但也还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

莫角山是良渚城址的核心区，相当于良渚城址的宫庙区。莫角山东坡清理了堆积大量碳化稻谷的灰坑 H11（图六）[29]。此处位于莫角山东部山前脚陆地，且较为低平开阔，是作为市场比较理想的位置。中亚地区最初的城市是由围绕神庙的市场成长起来的。距今 5600~4800 年前的乌鲁克最早城市中的神庙，不仅是府库和祭祀地，而且还是剩余食物再分配的中心[30]。准此，也不能完全排除莫角山前脚存在粮食交易市场的可能性：大型坑里堆积的炭化稻米，是从失火的干栏式商品粮仓[31]里清理出来。



图六 莫角山东坡炭化稻谷堆积 H11

（引自《良渚古城——新发现与探索》图十二，《权利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到长江流域史前时期尤其是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时期，商品经济基础中，农业商品经济的重要地位与特点色。

长江流域以农业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催生的是民主管理政治体制。这是因为商品经济催生一个“中产阶级”。所谓中产阶级，就是靠自身的劳动（主要是手工业和商业）获得财富以维持比较富裕舒适的家庭生活的阶层，他们从劳动人民阶层或阶级中发展出来，还有可能凭借财富谋求政治权力与管理权力而转变为社会的上层——统治阶层。商品经济是以自由公平交易为基本原则，加之“中产阶级”的形成，民主政治体制成为必然。“中产阶级”基于其“中等收入经济实力”，势必形成独特的彰显财富的、最求本阶层品味的“中产阶级文化”，以建筑、墓葬、用器的形式，可以保留在考古遗存之中。Emanuel Mayer 曾经从都市生活与美学的角度，利用建筑与墓葬考古资料，比较全面地分析公元前 100 年至公元 250 年罗马帝国的中产阶级，并且从理论上指出了中产阶级与商业的天然联系[32]。

我曾提出，崧泽文化晚期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探索古典型艺术的新浪潮”，是以商品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以脱离了日常生产和小商品生产的艺术家阶层出现为前提[33]。实际上，除了艺术家出现之外，还由于中产阶级的文化形成之后，对于彰显个性与财富的艺术品的追求，催生了艺术品市场的出现，艺术家阶层能够靠艺术创造换取生存资料，才有可能形成独立的艺术家阶层。罗马帝国时期的中产阶级的住宅建筑装饰与墓葬石雕，无不以古典艺术的形式表达，将源自希腊的古典艺术推向一个顶峰[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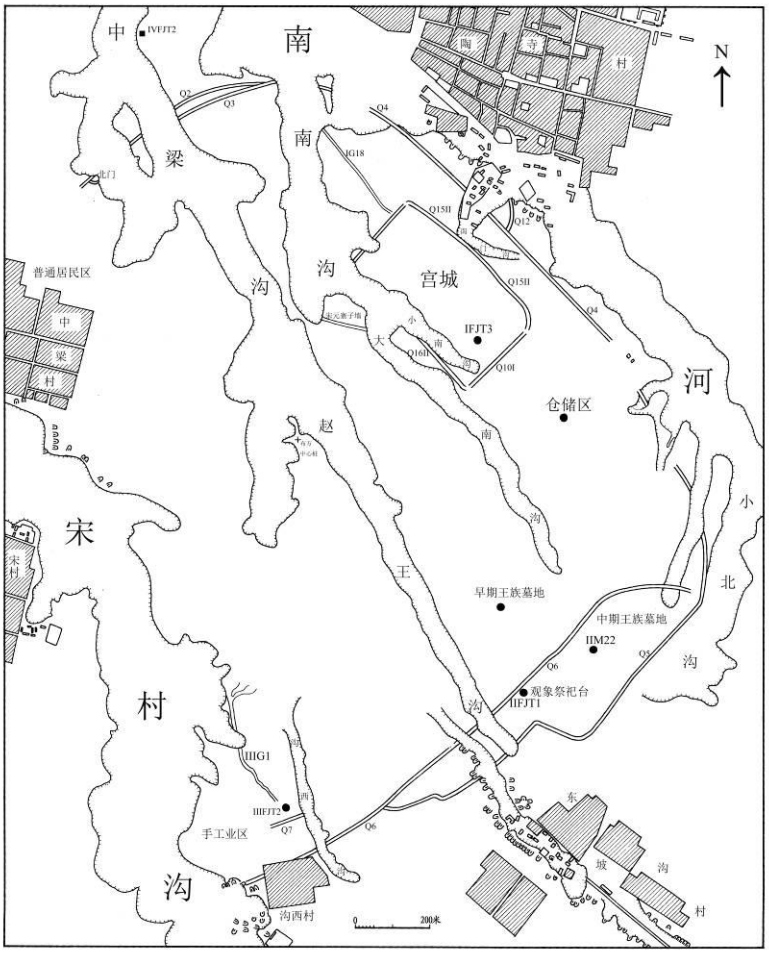
良渚文化时期，中产阶级的墓葬则以大中型墓葬的形式凸显出来。比如浙江平湖庄桥坟良渚文化墓地少数墓葬随葬品丰富，多达 50 件以上，出有玉璧或玉钺等玉礼器等，这些墓主应当是家族中的精英，他们也很可能是家族中的“中产阶级”。而大部分墓葬随葬品 10 件左右，当属于家族中普通而数量最多的族人。而少量的东西向墓葬几乎没有随葬品[35]，属于家族中的赤贫者，这些人是少数。

同类的墓葬还可见于良渚城址群里的桑树头、吴家埠、荀山周围、羊尾巴山、小竹园、钵衣山、王家庄、卢村、前山、里山、黄泥口、盛家村、扁担山、钟家村、卞家山等遗址，出土琮、璧、钺等重要玉器[36]，足见良渚遗址群内的“中产阶级”数量也十分可观，他们无疑是良渚社会统治集团的支柱。大墓的墓坑长度一般在 3 米以上，宽度多超过 1 米，葬具也较考究，有的棺椁兼备。这些中产阶级等级地位显然低于瑶山[37]和反山[38]最高领导集团，却明显高于随葬 10 余件器物的普通民众，恰恰符合中产阶级的层级——介于统治者与普通平民之间。随葬品在 10 件左右的普通平民墓葬还可见于庙前、梅园里、文家山、钵衣山、上口山、横圩里、卞家山等遗址[39]。

“中产阶级”不仅作为中坚脊梁支撑着良渚文化社会，而且“中产阶级”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谋求政治上位，进入政界，晋升为社会的统治集团和管理公权阶层。刘斌先生洞见，瑶山和反山墓主作为良渚文化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有善耕织、善木作、善治玉的特殊技能[40]，可以作为原本就是劳动者的“中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有力证据。

商人或成功的手工业者从“中产阶级”到“统治阶级”华丽转身，必须依赖从自由公平交易的商品经济中所获得的财富，同时社会必须存在基于公平竞争甚至是竞选获得统治、管理公权的民主政治体制，使这种华丽转身成为可能。因此，良渚文化的“中产阶级”从主观到客观，都会将良渚文化社会的政治引向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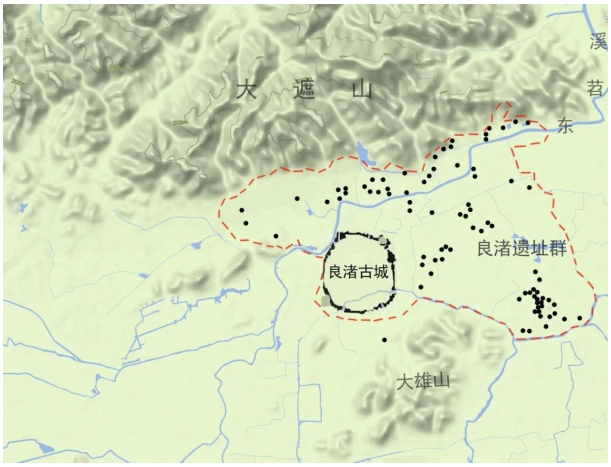
与之相反，黄河中游地区以小农经济为社会经济基础，在此经济基础上建立的社会呈金字塔形，缺乏“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的中坚，社会政治集权性突出。以陶寺为例，陶寺早期王族墓地中，不足总数 0.6%的统治者，与近 4%的官僚，凌驾于 95.4%的赤贫平民之上[41]。陶寺中期城址布局发反映出来，统治者利用手中的空间控制权，将手工业工匠连同工官管理手工业区安排在远离宫城 1.5 公里以外的外郭城东南部今宋村一带；将普通居民区驱赶到距宫城 1 公里以外的外郭城西南部今中梁村一带[42]（图七）。而陶寺城址存续期间，外郭城外周遭 2 公里之内没有同期聚落，都城的向心性的凝聚或向心性的控制明显[43]。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良渚城址内外 10 平方公里之内，50 余处良渚文化遗址群散布，没有明显的向心性空间控制（图八），多以宜居高台为依托[44]，地理微地貌环境因素高于空间控制因素。



图七 陶寺遗址布局图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长江流域史前时期的市场化商品经济所造

就的民主政治，要求相应的意识形态为其服务。例如，良渚文化的众多大规模的祭坛、为数可观的高等级玉敛葬、大量玉器上精美繁缛的象征性纹饰，都表明良渚文化的社会管理与统治在精神层面严重依赖宗教，因而李伯谦先生称良渚文化文明和国家是神权与王权和军权结合且神权为主的国家[45]。秦岭博士分析认为良渚城址外的瑶山墓地南北排墓成员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46]。我进一步认为，瑶山与反山墓葬的墓主很可能不存在夫妻关系，很难判定同属一个王族，加之刘斌先生分析认为这些领导人个个工艺身怀绝技，瑶山和反山的良渚社会最高管理层，有着分工和职分的不同，是由良渚“中产阶级”中的优秀分子竞争上位的领导人。也即是说，瑶山和反山是良渚社会最高领导层的公共墓地，而非王族墓地。这便强烈意味着良渚社会最高统治与管理权力是民主公权。如此民主公权的领导层，唯有依赖选举才能产生。



图八 良渚遗址核心区遗址群分布示意图

（引自《良渚古城——新发现与探索》图二，《权利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

与良渚文化社会民主政治相映成趣的是，李伯谦先生将仰韶文化归为王权与军权结合的王权国家[47]，其特点是大墓简葬，不崇尚玉器，宗教色彩不浓，社会政治凸显务实。我认为，黄河中游地区以庙底沟文化（或称仰韶文化晚期）、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陶寺文化为代表的史前社会，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集权政治，也就是李伯谦老师所称“王权”政治。黄河中游地区的集权政治与长江流域的民主泾渭分明，是两条不可调和政治道路。两河流域两种不同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两河流域对立的政治道路抉择，必定形成两种对立的、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斗争。

庙底沟文化大墓拒绝“良渚式的”奢华的玉敛葬，不是河南灵宝西坡的领导人从内心里拒绝奢华和玉器[48]，而更多的是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拒绝和排斥作为“良渚式”的民主政治意识形态之一的玉敛葬。因为玉敛葬从根本上说源自良渚文化“中产阶级”的炫富丧葬文化传统与思想，中产阶级不仅是良渚民主政治的中坚拥趸，而且是集权政治思想的掘墓人，因此与庙底沟文化的集权政治意识形态格格不入。

由于庙底沟文化领导人对于玉器和玉敛葬的排斥态度，导致庙底沟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社会上上下下对于玉文化和奢靡生活方式的全面排斥。庙底沟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陶器无论从制作技术还是从造型艺术与装饰艺术上，都比良渚文化的大宗陶器整体差距甚远。庙底沟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即使出土寥寥几件玉器，也几乎全部素面，与良渚文化玉器繁缛的装饰风格形成强烈的反差。此外，庙底沟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几乎不使用奢华费工的漆器。以往，学界通常从黄河中游地区的人们对于玉器、漆器的审美价值观迥异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来解释上述差异，黄河中游地区史前的人们勤俭务实的社会心理与长江流域追求奢华的社会心理不同，却很难解释从陶寺文化开始至夏商周三代，黄河中游地区却接受并钟爱玉

器、漆器，盛行厚葬、美食。目前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黄河中游地区的人们在审美价值观上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们没有区别，庙底沟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人们，完全出于抵御良渚文化意识形态的目的，排斥良渚文化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及其文化的渗透与积压和诱惑。非常有趣的节点在于，良渚文化衰落之后，表明长江流域以市场化商品经济为基础的文明中心和民主政治的衰落，黄河中游地区在意识形态斗争领域里失去了强劲的对手，后继的陶寺文化反而开始接受玉器、漆器、厚葬、美食等等奢华的生活方式。从陶寺文化开始，地中之都、中土之国的最本初的“中国”概念正式诞生[49]，意味着小农经济基础上集权或王权政治统治，同市场化商品经济包括农业商品经济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期斗争中最终胜出，同时也宣告长江流域建立在市场化商品经济基础上的民主政治模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三、小结

通过上述粗略分析，不难看出，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早期中国，在前期成长阶段——仰韶文化至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受到长江流域市场化商品经济基础上民主政治意识形态的利诱、挤压和冲击，激发了黄河中游地区小农经济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顽固抵触的应激反应，倒逼黄河中游地区自强不息，形成了王权占主导地位的邦国，如陶寺。

足见，假如没有长江流域史前文明中从经济政治的角度对黄河中游地区的挤压、利诱与碰撞，黄河中游地区不会自发地进化出早期中国，更不会殚精竭虑地强调本地是“地中”以证明自己的正统性、排他性与合法性，也不会特别注重“天下观”这类极富集权政治抱负意义却对商品经济没有实用价值的观念。

也正是由于建立小农经济基础上的集权政治在中原地区的胜出，诞生了夏商周三代王朝国家，中原地区基于“地中”宇宙观的政治话语体系从此占据了中国历史的正统地位，具有绝对优势，因此对于以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流域的商品经济及其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文明成就进行全面掩盖，很可能对长江流域史前当地话语体系记述的辉煌的文明历史，进行彻底的去记忆化。以致现存的先秦典籍对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文明历史的记载，语焉不详，仅留下类似蚩尤、三苗、禹迹等中原体系框架里的神话传说的片言只语。

不仅如此，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彻底胜利的中原王朝，从此全面压制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民主政治意识形态，全面打压市场化的商品经济，成为中国历代王朝奉行的“重农抑商”政策的指导思想。

附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陈明辉先生积极热情地为本文提供莫角山 H11 和茅山稻田遗迹考古资料，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注释：

① 曹兵武：《辐与辏：史前中原文化优势的确立——兼论早期中国与华夏文明观的形成》，《中原文化研究》2015 年 6 期。15 页。

② 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 年。

③ 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 2000 年的中原图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

④ 韩建业：《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早期中国研究》第 1 辑，文物出版社，2013 年。19~35 页。

⑤ 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⑥ 段宏振：《中原核心文化区的形成与早期中国》，《早期中国研究》第 1 辑，文物出版社，2013 年。97~106 页。

⑦ 李新伟：《“最初中国”之考古学认定》，《考古》2016 年 3 期。

⑧ 何驽：《最初“中国”的考古探索简析》，《早期中国研究》第 1 辑，文物出版社，2013 年。36~43 页。

⑨ 何驽：《从精神文化考古的维度看中原观念的出现与形成》，《中原文化研究》2015 年 5 期。41~50 页。

⑩曹兵武：《辐与辏：史前中原文化优势的确立——兼论早期中国与华夏文明观的形成》，《中原文化研究》2015 年 6 期。15~25 页。

[11] 何驽：《长江流域文明起源商品经济模式新探》，《东南文化》2014 年 1 期。53~64 页。
[12]何驽：《关于崧泽文化商品经济的思考》，《东南文化》2015 年 1 期，88~94 页。
[1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 年 1 月。
[14] 俞为洁：《饭稻衣麻——良渚人的衣食文化》，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 年。12~13 页。
[1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崧泽之美》，浙江摄影出版社，2014 年。231 页。
[1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崧泽之美》，浙江摄影出版社，2014 年。230 页。
[17]小柳美树：《崧泽文化的石犁》，崧泽文化学术研讨会讲演，2014 年 10 月 11 日。杭州。
[18]何驽：《关于崧泽文化商品经济的思考》，《东南文化》2015 年 1 期，88~94 页。
[19] 溯知：《崧泽时代的皖江两岸（摘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崧泽文化学术讨论会会议资料》，2014 年 10 月。杭州。
[20]俞为洁：《饭稻衣麻——良渚人的衣食文化》，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 年。13~16 页。
[2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湖市博物馆：《浙江平湖市庄桥坟良渚文化遗址及墓地》，《考古》2005 年 7 期。
[22]俞为洁：《饭稻衣麻——良渚人的衣食文化》，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 年。16~18 页。
[2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慈湖遗址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建所十周年纪念》，科学出版社，1993 年。
[24] 苏州博物馆等：《江苏吴江龙南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文物》1990 年 7 期。
[25] 【日】中村慎一：《稻の考古学》，（日本）同成社，2002 年。155 页。
[26]俞为洁：《饭稻衣麻——良渚人的衣食文化》，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 年。19 页。
[27] 王宁远：《从村居到王城》，杭州出版社，2013 年。83~87 页。
[28]郑云飞，陈旭高，丁品：《浙江余杭茅山遗址古稻田耕作遗迹研究》，《第四纪研究》第 34 卷第 1 期，2014 年 1 月。85~96 页。
[29]刘斌、王宁远、陈明辉：《良渚古城——新发现与探索》，《权利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文物出版社 2015 年，第 51-71 页。
[30] Brian M. Fagan, 1992. *People of the Earth: An Introduction to World Prehistory.* Seventh Edition. Lindbriar Corporation. Page 447.
[31]俞为洁：《饭稻衣麻——良渚人的衣食文化》，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 年。27~29 页。
[32] Emanuel Mayer, *The Ancient Middle Classes: Urban Life and Aesthetics in the Roman Empire 100 BCE-250 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3]何驽：《关于崧泽文化商品经济的思考》，《东南文化》2015 年 1 期，88~94 页。
[34] Emanuel Mayer, *The Ancient Middle Classes: Urban Life and Aesthetics in the Roman Empire 100 BCE-250 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湖市博物馆：《浙江平湖市庄桥坟良渚文化遗址及墓地》，《考古》2005 年 7 期。
[3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良渚遗址群》，文物出版社。2005 年 12 月。
[3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 年。
[3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文物出版社出版。2005 年 10 月。
[39]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良渚遗址群》，文物出版社。2005 年 12 月。
[40]刘斌：《神巫的世界——良渚文化综论》，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 年。147~157 页。
[41]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 年 6 期。
[42]何驽：《都城考古的理论与实践——从陶寺遗址和二里头遗址都城考古分析看中国早期城市化进程》，《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 年。3~58 页。
[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2010 年陶寺遗址群聚落形态考古实践与理论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 21 期。2011 年 1 月。46~57 页。
[4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良渚遗址群》，文物出版社。2005 年 12 月。
[45]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玉器观察随想》，《文物》2009 年 3 期。
[46] 秦岭：《环太湖地区史前社会结构的探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3 年。
[47]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玉器观察随想》，《文物》2009 年 3 期。
[4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灵宝西坡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 年。
[49] 何驽：《陶寺圭尺“中”与“中国”概念由来新探》，《三代考古》（四），科学出版社，2011 年 12 月。85~119 页。
何驽：《从精神文化考古的维度看中原观念的出现与形成》，《中原文化研究》2015 年 5 期。41~50 页。